

贺 芳
邓 联 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活动的动机与选本^{*}

【提 要】本文主要分析 1807 - 1850 年间在中国及“南洋”华人地区的新教传教士从事汉英翻译活动的情况，认为传教士翻译中国文献的主要动机是：介绍儒家学说，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根基，并借译介当时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获取母国对在华传教事业的支持，吸引更多传教士来华传教。其翻译文本的特征为，一是语言通俗，内容浅近；二是选择性译介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习俗等。

【关键词】新教传教士，翻译，动机，文本选择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 9648(2016)01 - 0012 - 05

19 世纪初，中国以及华语覆盖的东南亚地区成为当时基督教新教的重要传教目标地区之一。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的活动涉足教育、出版和医疗等领域，其中教育和出版所包含的重要工作便是翻译。无论是西方文化的输入，还是中国文化的输出，翻译都是传教士所依托的重要手段。

从文化交流层面看，肇始于两百年前的这场新教传教运动，是新教徒将其自认为优越的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化强行灌输给中国这个东方帝国的一次文化交汇。众所周知，在这一交汇中，不论中国一方如何设法抵制，中国文化终究是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这一时期的传教士的著述和译作，使西方在最渴望了解中国的时候得到了大量所需知识和信息。其中，被这批传教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文献，内容涉及中国典籍、通俗作品、官府文件、时事报道等。他们所编写的大量工具书和汉语学习读物，也含有很高的汉英翻译成分。与同时期的相关外交官和汉学家一道，他们较成规模地将中国文化与国情选择性译介输送给了西方世界，并对当时西方国家对华政策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本文将在分析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国观”的基础上，讨论他们从事汉英翻译活动的动机和选文上的主要特点。

1.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

本文所指“早期”，是指从马礼逊来华 (R. Morrison) 的 1807 年起至 1850 年左右。本文选择这一时期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传

教活动和翻译活动均有其独特特征。以《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 创刊和《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停刊为标志的新教传教中心由广州北移上海，清朝政府由五口开放进而全面弛禁，等等，这些标志性事件均发生于 1850 年前后。对于传教活动而言，1807 - 1850 年阶段具有两大鲜明特征：其一，是新教在晚清中国的初创阶段；其二，时值清朝政府对基督教传播实行禁止或限制政策，新教传教士将翻译与出版作为这一时期在华传教工作的主要工作。

本文所指“在华”，不仅指满清统治下的中国，而且包括东南亚“华人世界”¹。因为，在新教入华早期，由于晚清的严厉禁教政策，最先来华的马礼逊和米怜 (W. Milne) 不得不在南洋马六甲 (Malacca)、槟榔屿 (Penang)、巴达维亚 (Batavia) 等地建立对华传教基地，从事在中国遭禁的汉语学习、书籍翻译、印刷出版和教育传教等活动。在这些地方进行的活动，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密不可分，人员也多有相互往来。参照同类研究惯例，本文将这些地区的新教传教士也纳入讨论范围。

自 1807 年伦敦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派出马礼逊起，到 1850 年止，新教来华共有传教会 17 个，传教士 127 人。其中出版或发表过汉英翻译作品的有 17 人，他们是：马希曼 (J. Marshman)、马礼逊、卫三畏 (S. W. Williams)、裨治文 (E. C. Bridgman)、修德 (S. Kidd)、米怜、麦都思 (W. H. Medhurst)、柯大卫 (D. Collie)、波乃耶 (D. Ball)、雒魏林 (W. Lockhart)、叔未士

^{*} 本文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谁在翻译？——中国近百年译者群体构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J. L. Shuck)、郭实腊(K. F. A. Gutzlaff)、舜为仁(W. Deem)、文惠廉(W. J. Boone)、米威怜(W. C. Milne)、布朗(S. Brown)、娄礼华(W. M. Lowrie)等。

2. 中国观与英译动机

本文认为,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主要来自其母国的主流中国观和基督教新教对异教国家的基本认识与态度。作为译者的传教士,其中国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以及翻译的操作方式。

2.1 英美两国的中国观

18世纪以前英国的中国观,主要来自来华人士的游记、来华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有关叙述,其主流的态度是褒扬与赞誉。到了18世纪后则出现明显贬责倾向。正如张隆溪所指出的,虽然法国、德国在18世纪对中国的褒扬较多,但英国的情形不同。一改其17世纪的态度,18世纪英国文学里提到中国,往往贬责多于赞扬(张隆溪 2009: 93-102)。例如在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第二部里,就有对中国的强烈批评,而且“几乎给18世纪英国的中国批评定了调”。休谟作为一个理性的怀疑论者,他质疑天主教会的权威,也质疑一些耶稣会士对中国过分理想化的描述,并对中国的国民特性妄加批评。他的看法代表了18世纪英国人对中国的普遍意见,也影响了后来许多英国人对中国的理解。1792年马嘎尔尼来华使团了解到了清朝政府的腐朽和没落,回国后发表几部著作,使有关这种状况的信息广为传播。

美国对中国知识的了解早于1776年,当时主要是从北美殖民地的报刊杂志以及大量来自欧洲的著述中获得中国的信息,态度演变与英国基本同步。

2.2 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

18世纪末的基督教新教,由于宗教改革后对自身教义的过度自信,其对外传教活动更为强势,对异教世界的看法也更为偏激,认为非基督教世界必定黑暗、落后,因而认定其急需基督教的“拯救”。新教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后,发现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状况方面与西方列强存在巨大差距。其所见所闻在较大程度上强化了他们对满清中国的负面看法。

促使这批传教士对中国持有强烈负面看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欧洲中心观”和“基督

教中心观”。来到距离遥远、文化性质迥异的中国,他们习惯性地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一切人和事。例如,马礼逊曾将《五经》比作《摩西十诫》,将《四书》类比为《四福音书》(Morrison 1825: 34)。本来,这种将新鲜陌生事物比附于读者熟知的事物,是介绍新知时常用而有效的手段。但是,早期新教传教士在进行这类比附的时候,往往将“差异”视为“差距”,将“相异”视为“落后”,凡事皆从西方的、基督教的角度出发,自以为是地认为基督教和西方的一切都是优越的,而当时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不可理喻的。

2.3 中国观与英译动机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翻译中国文献,是受教会伦理观念的影响,“就宗教义理之寻求动机,以考究中国固有之思想文化”(王尔敏 1975: 2)。新教传教士之英译,其背后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对耶稣会士的继承。同时,因教义与中西状况对比所致的中国观的不同,使他们的翻译动机又与耶稣会士有了许多变化。综合来看,早期新教传教士的汉英翻译有着复杂的动机。

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们来中国后发现,就像基督教渗透在西方文明的各个方面一样,《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着沦肌浹髓的影响。他们深知,若要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作为基督教传播者的他们必须首先了解深刻影响中国人的儒家学说,因此他们把关注的视角投向儒学经典。同时,“传教士在对中国整体状况持负面看法的同时,考虑到中国对世界的巨大历史贡献,不敢把它变为殖民地,于是要先诋毁它”(Etiemble 1994: 388)。依照这一思路,他们对于儒家学说不敢轻视,但把它视为传教事业的天敌,并设法加以诋毁,甚至在译介《三字经》、《千字文》这样的蒙学读物以及蓝鼎元的《女学》这种译者比较欣赏的著作时,在其评论中也充斥着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负面评论。纵观早期新教传教士的汉英译作,众多的翻译文本,中国文明被基督教的尺子度量着,其魅力在西方难免大打折扣。

无论是教会还是传教士,都十分清楚正在扩张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信息的渴望心理(Danton 1931: 42)。1829年裨治文来华前,公理会在给他的指示中说“在你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要求你把有关中国人民的特征、状况、风俗、习惯等,特别要对这些方面受他们的宗教影响,向公

理会做出完整的报告。”马礼逊则在他所译的《中国春神》中表露其翻译的动机是面向英国大众，满足过去二十年激发出来的对中国的兴趣与关注(Morrison 1812)。

《中国丛报》创刊“导言”昭示其译介活动的指导思想：为了论证其传教的必要性、紧迫性，以获取母国对其异常艰难的传教活动的鼎力支持。借助英文著述和汉译中国文献以纠正耶稣会士等对中国充满赞誉的叙述，给西方世界提供“真实”的中国信息。在对中国情况的了解方面，这批传教士非常自负，并对其他的信息传达者的资格无端怀疑。在介绍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国的社会状况方面，诚如法国耶稣会士杜哈德(Du Halde)所言，“介绍中国的最佳方式，莫过于让中国自己说话”(转引自Percy 1761: title page)。翻译中国人自己的著作，无疑更加“原汁原味”。

3. 英译选本特点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受到各种历史因素的制约，如那个时代的传教环境、那一时期的神学理念、目标读者的需求与兴趣以及那批传教士的汉语水平和中国文化修养等。因而其选本跟耶稣会士和洋务运动时期的传教士译者相比存在显著差异。与同一时期的外交官译者和汉学家译者相比，其情形也大不相同。最为重要的是，其英译活动跟其他文字工作一样，具有鲜明的传教旨归。

3.1 选本通俗浅近，却无典籍巨著译本

与耶稣会士较多译介儒家经典著作相比，新教传教士翻译的多为通俗文献。他们所译经典作品数量较少，所译经典多为诸如《论语》、《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内容通俗浅近的作品。从事过汉英翻译的17名早期来华传教士译者，无一人系统翻译过“四大名著”，对这类文学巨著的译介仅有《三国志》中“董卓之死”、“黄巾起义”这样的节译，以及郭实腊对《红楼梦》故事的简要介绍。郭实腊所编译的“梦在红楼”介绍了《红楼梦》的故事梗概，于1842年5月刊载于《中国丛报》。从这篇“梦在红楼”不难看出他对《红楼梦》了解甚为肤浅，以至于把贾宝玉误认为女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传教士译者对四大名著这样的巨著难以把握。

对于代表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唐诗，没有资料显示这批传教士有过系统译介。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所编著的《北京传

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即《北京耶稣会士札记》丛书卷16)于1776-1814年间陆续出版，该书第4-5卷中即有关于唐诗及李白、杜甫的介绍，并有唐代诗人王涯的五言绝句“送春词”译文。德庇时(J. F. Davis)于1829年出版的《汉文诗解》介绍汉诗风格时介绍了李白的诗作及其生平，译介了杜甫的五言律诗“春夜喜雨”和王涯的“送春词”。既然有以上二人，特别是同时代的德庇时的介绍，传教士不大可能对唐诗毫无了解，但没有资料显示他们对于唐诗译介的兴趣。

这批传教士之所以选择通俗性的文献，原因之一是其汉语水平与所接触人群的制约。他们在进行翻译前汉语学习时间并不长，而且缺少本土优秀知识分子的指导，在浅显文本的翻译中尚且难免误解，对于典籍，则仅能粗通大意，而难解个中内涵。

在清末民初盛行的“外述中译”翻译模式中，传教士的知识结构对译介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选材等宏观方面(何绍斌 2006: 88)。在早期传教士的英译活动中，如果说译者曾经得到过一些本土人士帮助的话，这种帮助可能首先也是体现在选本上。因传教士接触的多为中国社会知识层次不高的人物，可以想见，他们从这些人士手中获得的书籍，自然多为通俗浅显者。

他们选择通俗作品进行翻译的第二个原因是其目标读者的需求。作为译者的传教士，自然知道儒家经典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翻译什么，要受到其读者对象的影响，要看目标读者能够接受什么，愿意接受什么。从他们翻译和修订《圣经》汉译本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新教传教士在翻译中特别注重读者的需要。完成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各种《圣经》译本，其主要差别并非是在教义方面。“吸引每个翻译组从事一种新的《圣经》译本翻译的原因，似乎在于他们对前一任译者的译本中的语言选择或翻译原则不太满意”(韩南 2010: 16-37)。据此推断，同样是这批译者，他们在英译中国文献时，必然也会充分考虑英语读者所乐于接受的内容和语言风格。

17、18世纪，西方通过传教士、商人和游客开始了解中国，对中国的社会管理和伦理政治深为钦佩。所以中国书籍中最先为西人译介的是儒家经典。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当他们在这样的思想艺术框架下接触中国文化时，思

想上,道家思想较前受到青睐;艺术上,追求异国情调、色彩、激情、幻想这样一些审美要求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西方人的选择。这一重要思潮一方面必然影响着传教士自身对中国文献的好恶,同时他们在评估目标读者的阅读兴趣时,必然考虑这一变化的影响。

的确,为获取母国全面支持,传教士的翻译选本不得不考虑国内读者的兴趣与需求。德庇时曾回顾欧洲近代翻译中国主要文献的基本情况,特别是18世纪法国传教士的译作时,他将所译文献分为“典籍与历史”和“文学”两大类,特别指出《四书》、《五经》等典籍类译作在欧洲不如通俗类译作受欢迎(Davis 1865: 65-66)。

早期传教士选译文本多具通俗性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译本是作为传教士本人、其他传教士以及英华学院学生等人的学习材料。其主要目的是方便汉语学习,内容与语言的浅显更易服务于此目的²。将译本作为学习汉语的材料,是当时普遍的做法。例如,由韦斯顿(S. Weston)翻译并于1814年在伦敦出版的《范希周》(*Fan-Hy-Chew*)体例为英汉对照,且附有注释和中文语法讲解。

3.2 选择性译介有差异性的文化习俗

新教传教士来华早期人数较少,且与商人、外交官、军人的目标高度一致,都是争取中国的门户开放。因此,他们在传教任务外还身兼世俗事务(费正清 1999: 550)。他们自认是向外扩张与工业化国家的公民,认为基督教教义与西方文化难以分离,往往借布道将西方的世俗观念与基督教义“打包”输送给中国受众。在他们看来,晚清政府管理、人际关系、妇女地位、卫生习惯、群己关系等,都是跟宗教信仰有着不可分割关联的文明要素;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在这些方面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自然引起了强烈关注。译介当时中国的状况便成了首选。

裨治文的传记资料披露了他所主办的《中国丛报》的报道标准。《中国丛报》的编辑们认为过去天主教传教士介绍中国时带有过多的赞誉,他们想给西方展示一个“有瑕疵”的中国,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并获取母国对传教事业的经济支持。因此,丛报为此刻意描绘中国的动机值得厘清。

新教传教士来华时,统治中国的是黑暗腐朽的清朝政府,社会状况与英美等国相比确有天壤之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当时的中国社会与西方

社会存在的差异正是他们所乐意看到的。因为,对于传教士而言,传教目标地区越是落后,就越是需要他们的“启蒙”与“拯救”(Danton 1931: 1)。手段较耶稣教更为直接的新教,已经不屑于耶稣会士那种妥协心态,他们更加倾向于强力推进的手段³,极力透过有色眼镜观察中国事物及文化习俗,借差异由此塑造一个落后的、急需“拯救”的中国形象,以获得传教合法性,争取母国支持,这便是他们选择性译介当时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习俗的强烈动机。

4. 结语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所从事的汉英翻译活动,实际上是19世纪上半叶基督教新教在全世界传教活动的一个缩影。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时间,较在印度等国传教稍晚,而与其在世界其他许多地区传教则基本同步,其进程与所遭遇的问题也基本类似。其时,各教会已经通过在印度等地的传教得出一个经验:初到一个国家,例如印度,由于传教往往被禁止,传教士都只能从事语言学习与教育、翻译与印刷等事务。

传教士从事的英译活动,较之于早期耶稣会士以及19世纪中后期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在翻译动机、拟译内容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等方面均有显著不同,与同期在华商人和外交官译者所事英译活动在上述方面也呈现出其独特的群体特征。从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英译活动,其实是紧紧围绕传教这一目的,正是这种强烈的传教动机,使得这批传教士译者耗费大量精力从事翻译活动,而且在翻译选本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我们在考查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活动时,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才能不被他们涉足教育、出版和医疗等领域的表象所蒙蔽。

注释:

- 1 当时的许多文件和出版物,以及后人的相关研究,常用“mission to Chinese”和“missionary to the Chinese”这样的表述。其原因正是因为所指包括东南亚华人世界在内。
- 2 参见《中国丛报》第7卷第117页。该文指出,从学习中文的角度分析四类文献英译的效果,通俗文献居第一。
- 3 一批早期新教传教士虽然反对鸦片贸易,但几乎一致呼吁或支持用战争手段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正是这种心态的影响。

参考文献

Bridgman ,E. C. 1832. Introduction [J].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 1 - 5.

Danton ,G. H. 1931. *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Earliest Sino - American Culture Contacts 1784 - 1844*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avis ,J. 1865. *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M]. London: John Murray.

Etiemble. 1994. *L'Europe Chinoise II , De La Sinophilie A La Sinophobie* [M]. 许钧、钱林森译。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Percy ,T. 1761. *Hau Kiou Choo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M]. London: Dodsley.

Morrison ,R. 1812. *Horae Sinica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M]. London: Black and Parry.

Morrison , R. 1825. *Chinese Miscellany; Consisting of Original Extracts from Chinese Authors , in the Native Character* [M]. London: S. McDowall.

费正清, 1999, 《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 [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韩南, 2010, 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 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 16 - 37。

何绍斌, 2006, 越界与想象 - 晚清传教士译介活动研究 [D]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王尔敏, 1975, 《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叙录” [M]。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张隆溪, 2009, 《17、18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中译本序 [A] 任继愈编, 《国际汉学》[C]。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93 - 102。

(贺 芳: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邓联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 2015 - 12 - 16
通讯地址: 410004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二次全国学术研讨会 暨英汉对比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征稿通知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二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英汉对比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至 23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主办,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研讨会的主题为“本土化与走出去”。一方面探讨西方的理论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 如何兼顾中国的研究传统和民族语言的实际情况; 另一方面, 在全球化的视野下, 对如何响应政府主导的文化“走出去”战略, 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的历史和现状、方法和路径、障碍和对策展开讨论。会议在英汉语言对比、翻译研究及中西文化对比三大板块之下, 设若干议题:

1. 当代语言学理论与英汉语对比研究
2. 英汉对比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
3. 语料库翻译学
4. 翻译对汉语影响的研究
5. 典籍外译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研究
6. 文化强国战略与国际汉语教育研究
7.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差异与文本误读研究

会议语言为中文和英文, 要求参会者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以前将提交会议的论文全文 (A4 纸, 汉字 5 号字, 行距 1.5) 用 Word 文档发至大会组委会邮箱: sjtu2016@126.com

大会联络人: 朱一凡、李晓倩 联系电话: 021 - 34204704, 18801969492

欢迎国内外学界同仁积极参与, 踊跃投稿。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